

廖承志一家在香港统战

李向锋

廖承志曾用名何柳华，广东惠阳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是民主革命的先驱廖仲恺、何香凝之子。在香港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廖承志一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廖承志的三重身份

廖承志在香港时身兼三职：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同时也是“保卫中国同盟”的中央委员兼秘书长，还是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武装的发起者和领导者。

卢沟桥事变后，周恩来建议在香港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并建议由廖承志去香港筹建办事处。1937年10月，毛泽东与廖承志进行长谈：“统战工作很重要，你在国民党那边有许多朋友，你要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扩大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救国运动。”谈话进一步明确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三项职责：一是向海外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抗日主张；二是把海外华侨和各国提供支援物资送到各抗日根据地；三是搜集国际动态向中央报告。

1938年1月初，廖承志抵达香港，担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1938年6月14日，保卫中国同盟正式成立，刚开始在宋庆龄家中开会和办公，后来会址设在西摩道21号。保盟积极开展工作，广泛联络世界各国进步友好人士，宣传中国各地的抗日救亡情况，报道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击敌寇的英雄事迹，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廖承志充分发挥“香港八办”和“保卫中国同盟”的作用，利用其特殊的社会关系，一方面在地方党的协助下，发动香港海员工会、余闲乐社、惠阳青年会、学生联谊会、晨钟社等团体进行义卖募捐；一方面广泛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

为了方便华侨捐款的接收，廖承志通过他在华比银行任副经理的表妹夫邓文钊，在华比银行开设账户，又以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名义在香港《大公报》上刊登启事，通告各界同胞捐赠的物资交由“救军驻港特派代表廖承志收转”。

1938年10月13日，廖承志接到中共中央关于要在东江日占区后



廖承志1908年9月25日出生于日本东京。图为1909年廖仲恺(后右)、何香凝(后左)及廖梦醒(前右)、廖承志(前左)在东京。

方开辟游击区的指示，通知中共香港海员工会书记曾生立即开会，研究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廖承志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在东江一带开辟游击区的指示精神。会议决定由曾生、周伯明等带领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到惠阳县坪山，建立中共惠宝工作委员会。12月2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惠阳成立，曾生任总队长，周伯明任政委。

此外，珠江纵队、琼崖纵队等华南敌后抗日武装成立、发展、壮大均与廖承志的支持、帮助、组织密不可分。廖承志发起和领导了东江抗日游击武装，为建立和发展以惠州为中心的东江抗日根据地作出卓越的贡献。

何香凝参与了“所有救济活动”

1915年，宋庆龄与孙中山在日本结婚，廖仲恺、何香凝带廖梦醒和廖承志去孙中山家道贺。廖梦醒说：“自那时起，她待我和承志一直亲如子侄。我们叫她姑姑。”廖承志也尊敬地称宋庆龄为叔婆。他说：“叔婆，这是

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在香港组织中国大同盟以来我姐姐和我尊敬她的专用语。”

“保盟”由宋庆龄任主席，宋子文任会长，廖承志任中央委员兼秘书长，廖梦醒任办公室主任。廖梦醒担任“保盟”的办公室主任，目标主要有2个方面内容：(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

“保盟”从世界各地募集捐款、医药物资，在香港的三年多时间里，共送出120多吨医疗器械、药品和其他物资，平均每个月送出3吨。华侨每捐一笔款，何香凝就送一幅画。宋庆龄曾说，抗战时期，何香凝参加了我举办的所有救济活动。宋庆龄每收到一笔捐款就会在捐款收据上签名。甚至许多人为了得到她的签名而捐款，为此宋庆龄“磨硬了自己的手指”。

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和姐姐廖梦醒积极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

同盟”工作，宋庆龄表示何香凝参与了己组织的所有募捐活动。

邓文钊亏钱办《华商报》

1941年2月10日，在《新中华报》受国民党压迫、其他在港媒体被收买的情况下，廖承志向周恩来请示：“现到港文化人相当多。我们决定在港办《华商晚报》。由邓文钊等做老板。”周恩来立即接受了廖承志的建议。

廖承志让邓文田、邓文钊兄弟出面面向港英当局申请注册办报。办报方针是：对内要求团结、民主、进步，反对分裂、独裁、倒退；对外反对英美对日妥协，揭露和批评英美绥靖政策和“东方慕尼黑”阴谋。

4月8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战报——中文晚报《华商报》创刊。宋庆龄为该报题词：“为坚持抗战作有力之后盾，为保持团结作有效之喉舌，为实现民主作正义之呼吁，为人民幸福作公正之申诉，给予侵略者以严重之打击。”为了增强华商寓意，头版正中还刊载了何东爵士题词“唤醒侨胞”。

《华商报》从创刊起，就以其翔实的内容、鲜明的立场、透彻的分析、生动的文笔、独到的见解，以及精辟的国际评论、名人荟萃的文艺副刊，吸引着海内外众多读者。到8月底，《华商报》成为香港晚报销量王者，超过5500份。

廖承志表示，《华商报》开办迄今(8月)由邓文钊出资金，由于稿酬丰厚，每个月亏损3500港币。为了弥补亏空，邓文钊用2万港币购买香港科学印务公司，同时和陈嘉庚合作准备筹办日报。胡绳曾评价邓文钊：“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他支持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办《华商报》就是一个突出的案例。”

国民党对《华商报》采取多种措施进行压迫取缔，一是由戴笠出面向香港警察总监俞允提出取缔《华商报》的要求；二是向比利时公使提出抗议，由比利时政府向华比银行施压，逼迫邓氏兄弟停止督印《华商报》；三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不给《华商报》发通讯稿，并企图破坏其与印刷厂关系。廖承志针对国民党的破坏，一方面请宋庆龄与俞允进行沟通，另一方面请周恩来与英方进行沟通协商。

1941年12月8日，日军空袭九龙机场。《华商报》连日发表社论，揭露日军侵略罪行。8日发表社论《一致打倒日寇》，9日发表宋庆龄文章《战争来到香港》，号召对法西斯主义抗战到底，建立反侵略的统一战线。11日发表社论《为反侵略加紧团结》，12日发表了最后一篇社论《团结动员抗拒日寇》，之后停刊。

(作者单位：中共惠州市惠城区委党校)

瞿秋白填词寄幽情

周二中



1916年2月7日，瞿秋白母亲金璇在家庭困顿中绝望自杀。母亲一死，家也就散了。为了寻找人生的出路，瞿秋白选择了去武昌、去黄陂。

当时，瞿秋白的内心是极为痛苦的，一个少年，家没了，自己的出路也不知在哪里，现在又寄人篱下，这事不论搁在谁的身上都扛不住。他的表兄弟周君亮总是想办法陪他到处走走，以缓解他内心的压力。

黄陂有一个重要的人文景点是铁锁龙潭。据民间传说，大禹治水时，把一条龙锁在了潭里，潭中铁柱拴一铁链，下垂潭底，因此被称为铁锁龙潭。

瞿秋白到黄陂的第二年元旦，周君亮与他踏着月色，穿过万户红灯的小街小巷，走到铁锁龙潭，坐在潭旁大石上面。周君亮回忆说：瞿秋白善吹箫，以所携玉品箫吹之，声音呜呜咽咽

转，不可卒听。那里月色甚明朗，照在潭水上反映回来。潭上三面都有高墙，水面反射月色映在墙上，涟漪晃动，别有风趣。铁锁龙潭不傍大街，是夜更无人到，在潭边低声细语，都有很清晰的回声。瞿秋白的箫声从墙上撞回来，叠为双声，更是幽怨。

瞿秋白吹箫完毕，在潭旁大石上占口联句，成《减字木兰花·铁锁龙潭》一首，词云：“一泓潭水，铁锁老龙潜不起。莫漫哀吟，听我悲箫宛转声。华年坐送，如电如云还如梦。珍重心期，休待秋霜入鬓时。”词写得极为沉重，他想着自己就是那条被铁锁套牢的老龙，何时才能有出头之日啊？

少年瞿秋白所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锻炼了他的性格，坚毅的性格在他后来的人生道路上成为他的一笔财富。

周有光借学费上大学

刘建东



1923年，17岁的周有光报考了免费的师范学校，毕竟家庭贫困是一个重大障碍；可是心有不甘的小伙子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参加了号称当时“最好的大学”圣约翰大学的考试，还真考上了。但圣约翰大学属于贵族学校，一学期的学费高达200多块银圆，以周家当时的状况，就算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么多学费。

周有光将去不成圣约翰大学的事告诉了与他感情最好的三姐。当时，周有光的三姐刚在上海教书没两年，得知此事心急如焚，却也是无能为力，整天眉头紧锁、唉声叹气。这一幕景象被同事朱毓君发现了，在她的一再追问之下，才明白了周家的难处。朱毓君对周有光三

姐说：“你弟弟考进圣约翰大学又不进，太可惜了。我也没有钱，我去问我妈妈借，让他去上学，上了学以后再想办法。”周有光三姐点点头，又摇摇头，除了叹气，无言以对。

在苏州时，周有光曾跟着三姐去过朱毓君家，朱毓君妈妈很喜欢周有光，觉得这个小伙子今后肯定有出息，于是说：“我现在也没有钱，但是皮箱里放了很多嫁妆，拿一个皮箱去当，就可以当200多块洋钱的。”

周有光终于解决了上圣约翰大学的学费问题。他在这所学府主修经济学，辅修语言学。晚年的周有光每每讲述这段故事，总不免热泪盈眶，感激人生道路上的这位贵人。

文人与“小鸟天堂”

崔鹤同



1933年6月初，巴金造访广东省新会县。饭后，与一位朋友划船散心。河里生长着一棵硕大无朋的榕树，朋友说这里是“鸟的天堂”，有许多鸟在树上做窝，农民不许人捉它们。巴金没看到一只鸟的影子，“鸟的天堂”里没有一只鸟，巴金这样想到。

第二天，巴金他们划着船又经过那个“鸟的天堂”。这一次是在早上，阳光照在水面，也照在树梢。他们的船在树下泊了片刻。起初四周非常安静，后来忽然响起了一声鸟叫。朋友把手一拍，他们便看见一只大鸟飞起来，接着又看见第二、第三只。他们继续拍掌。很快，这片树林热闹起来了，到处都是鸟影：大的、小的、花的、黑的，有的站在枝上叫，有的飞起来，有的在扑翅膀。巴金的眼睛真是应接不暇。

小船向着下游的村庄划去，巴金依依不舍地回头去看那棵榕树，昨晚的眼睛骗了他，“鸟的天堂”的确是鸟的天堂啊！

56年后的1989年初，吴冠中从澳门返广州，听说新会县有个“小鸟天堂”，特地专程造访。

那天适逢雨天，风雨交加，道路泥泞，烟雨迷蒙，放眼那河流中的树丛之岛，树叶覆盖下毫无特色，吴冠中感到上了巴金先生的当了，因他题了“小鸟天堂”这个诱人的美名。

及至友人找来小舢板，赤脚撑伞，划向江中天堂，才见那榕树根枝交错缠结，冷落幽深。钻入垂枝密叶，将爬上岛之岸，鸟儿们警觉灾祸降临，振翅猛飞逃命，一阵骚乱，天堂顿失。

吴冠中心中大喜，回家前后作《小鸟天堂》大、中、小几幅，最大一幅，收藏在大英博物馆。

一个文坛大咖，一个画坛巨擘，都童心未泯，心有灵犀，对“小鸟天堂”心驰神往，情有独钟，身临其境，并著文泼墨，留下精品美文，也成文坛一段佳话。

重写“梅兰”续情谊

周惠斌

张大千与梅兰芳初识时，曾说：“你是君子，我是小人。”梅兰芳听了大惑不解，张大千随即解释：“你是君子动口，擅长演剧；我是小人动手，只会画画。”说完，二人开怀大笑。

20世纪30年代初，张大千寓居北平，与梅兰芳不时相聚，他们谈戏论画，相得甚欢。梅兰芳向张大千请教如何画美人，张大千认为，京剧与绘画在表情诉状、抒情达意、虚实多寡等方面，皆有相通之处，彼此可以汲取丰厚的艺术营养，因此回答道：“你自己就是一个最标准的美人，你只要把你戏台上的各种样子画下来就行了，千万不用再参照别人的样子了。”

那时，张大千将绘就的《荷花》等得意之作赠送给梅兰芳，梅兰芳则把自己的唱片、剧照等回赠给张大千。张大千经常到广和剧场观看梅兰芳的表演，而梅兰芳每次演出前，总要留出整排的戏票送给张大千，让他与家人、朋友一过戏瘾。

1948年4月，画家吴湖帆在上海邀请梅兰芳、张大千、谢稚柳在其画室迎春雅集。四人兴之所至，联手完成了一幅《梅兰双清图》。吴湖帆率先起笔，画上一束幽兰，梅兰芳接着乘



一九四八年，梅兰芳与张大千在上海。

势画上一枝腊梅，谢稚柳为画作点缀补白，张大千锦上添花，题写了一阙《浣溪沙》：“试粉梅梢有月知，兰风清露幽姿，江南长忆好春时。珍重清歌珠落，定场声里动芳菲，丹青椽笔妙新词。”整幅作品构思精妙，色彩淡雅；书画交融，珠联璧合，更从一个侧面赞誉了梅兰芳抗战时期在沦陷区蓄须明志、拒为日寇演出的民族气节，以及抗战胜

利后重登舞台为百姓歌舞的爱国热忱。

翌年8月，张大千应印度国际大学邀请前往讲学，梅兰芳在家中设宴为张大千饯行。

1982年，梅兰芳幼子梅葆玖与其师姐童芷苓率团赴香港演出，张大千弟子、台湾著名京剧演员郭小庄恰好在香港逢其演。她将梅葆玖的演出录像带携至“摩耶精舍”，放映给张大千夫妇观

赏。张大千看得津津有味，称赞梅葆玖酷似其父，颇有乃父遗风。郭小庄又转告了梅葆玖的请求：30多年前，吴、梅、谢、张四人携手合作的《梅兰双清图》，因岁月动荡，已不慎散失，请大千先生赐墨，复绘以作留念。大千千感慨不已，于是挥毫重绘《梅兰图》一幅。

画轴纵三尺，宽二尺许，左侧绘写一枝淡雅高洁、芬芳内敛的梅花，右侧描摹一束秀丽劲挺、青翠欲滴的幽兰，右上方抄录当年所题的《浣溪沙》词，又续写了一段跋语：“三十三年前，与朋辈集湖帆尺牘，弄笔为欢笑。湖帆先撇幽兰一握，晚华补梅花，乃索子倚小令题之，稚柳且为予易数字，晚华携携归玉轩。顷者，其公子葆玖在香港，云此画已成陈迹，不在人间矣。其尊人与湖帆俱相继弃世，倩友人要为补写。葆玖孝思如此，晚华当含笑九泉。而予年过腹腹，老泪纵横矣！八十四复爱大千。”缅怀故人、赓续交谊之情，溢于毫端，跃于纸上。

梅葆玖收到《梅兰图》后，不胜感动，复函答谢：“顷展宝绘，如仰丰仪。复蒙藻饰，不胜追思。窃以香生幽谷，照春辉而衔露，妙笔横斜，借一枝而遣词。关河虽隔，云天高谊难忘；鱼雁能通，拜谒登堂有期。临风翘企，不尽依依，谨布谢忱，伏希手披，顺候起居，恭祝绵颐。”并依嘱精选了自己的《霸王别姬》剧照和便装照各两张，寄呈大千先生。

此后，梅葆玖将《梅兰图》视若至宝，因为它不仅饱含了张大千和梅兰芳两位艺坛大师的深厚友情，而且凝结着大千与梅氏父子两代人跨越近半个世纪的感人故事。